

17. 106

远 安 县

文 史 资 料

第 一 辑

5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远安县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小 组 编

目 录

前言.....

抗战时期的远安特别支部.....刘 真（1）

①何基沣同志抗战时期在远安的二三事.....（5）

“远安奸党案”始末.....贺锡龙（10）

《宜昌移动演剧第一队》在远安.....汪玉宸（15）

抗战时期的远安特别支部

刘 真

抗战时期，我党在远安建设过一个特别支部（简称特支）。

一九三八年十月成立荆（门）、当（阳）、远（安）中心区委，区委书记曾志同志（女、当时叫曾霞）。中心区委派李平同志（女）到远安去，她以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的身份驻远安农村合作事业办事处。农村合作事业办事处是国民党的组织。这个组织的来历是鄂中特委利用李范一（国民党左派、主张国共合作抗日）同国民党建设厅长石英（国民党中间派）的友好关系，在李范一的家乡应城汤池开办“农村合作事业训练班”。董必武同志派陶铸同志去领导。湖北省委就利用这个合法形式，用短期轮训的方法，训练和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和党的工作干部。这批干部中大都是学生，他们来自湖北各地及北平、天津流亡学生。一九三八年春，省委委托陶铸同志亲自指派汤池合作事业训练班第一期学员郑速燕（女，武汉地下党员）、吴云鹏等同志到荆门，远安一带以开办合作事业的合法身份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

省委另从宜昌党组织中委派苏震、张清华（女，当时叫张芳松）、李平（女）、史维汉和我等同志到当阳、远安一带进行革命活动。李平是派进远安最早的党员，她是松滋人，当时是中学生，后读武昌女师，家庭是大地主，其父是

开明人士，很同情我党。她家是我鄂西南区党委机关和钱英同志的住处。钱英派李平到荆门，后由曾志派她到远安。李平是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到远安，史维汉接着到远安。我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九年七月代表荆当远中心县委分管远安党的工作。曾志、张清华等同志也曾在一九三八年底和一九三九年到过远安。

开始，远安特支只有李平和史维汉同志，特支书记是李平，组织委员是史维汉，我的任务是上下跑传达上级的指示。后来发展了城关张代谨入党，参加特支为委员。通过张代谨的关系又在城关等地发展了几个党员。组织力量扩大后，由特支转为特区委，区委书记李平，付书记史维汉，区委张代谨。

张代谨同志，是我们当时的主要依靠，对我们开展远安活动的支持很大。通过他在远安一共发展党员约十人，活动的中心在远安城关及茅坪地区。

当时远安特支的主要任务是：1、发展党组织；2、宣传抗日，对群众进行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3、准备武装斗争。

远安没有沦陷，日本人曾经攻占远安，但时期不长就又转回当阳去了，这地方是国民党统治区。后来我们成立了襄西地委和襄西独立团，在荆门城南和当阳脚东一带打游击，这时张代谨同志来过襄西地委和独立团找我们联系工作。襄西地委从一九四〇年底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给张代谨同志坚持地下工作（隐蔽待机）的任务，当时也为我军做情报工作。

省委交给中心县委在远安的另一个任务是派我和地下党

员杨雄飞单线联系。杨雄飞曾参加过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后失掉联系。抗战初期党又和杨雄飞接上关系，在武汉沦陷前，省委把他派进国民党湖北保安第五团。杨雄飞以营长身份到远安，营部驻扎在远安北门外大地主熊耀坤家。这个营编制有营部医务室，设三个连、九个排，火力配备有机枪十三挺，重机枪三挺，迫击炮两门。杨雄飞在远安的主要任务是掌握国民党的这个营，根据党的指示作起义准备。我与杨雄飞单线联系，接头后将区委交待的任务一一向杨雄飞作了传达。后来，由于杨雄飞在发展党员中不慎重，发展了一个医官和一个连长为党员外，还在士兵中发展了少数党员，这样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怀疑，杨雄飞被撤职调离远安，与党组织脱离了联系。解放后，杨雄飞找我证明身份，被安排在华中农学院担任基建科长，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

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日本帝国主义攻占武汉已定局，湖北省地下党组织分别在鄂中建立特委、在襄阳建立鄂西北区党委、在宜昌建立鄂西南区党委，继续领导全省的抗日救亡活动。一九三八年底，成立了荆当远中心县委，县委书记曾志、组织部长吴云鹏、宣传部长是我，参加县委的还有李平、郑连燕、刘宝田、李德斋等同志。一九三九年曾志同志调走后，由苏震同志接任县委书记，组织委员李守宪。一九四〇年一月，为了便于领导抗日武装斗争，鄂西北区党委决定把荆当远和南宜保两个中心县委合并成立荆钟南宜特委，赵石任特委书记，吴云鹏任特委副书记，参加荆钟南宜特委的有我和李守宪等同志。荆钟南宜特委属鄂西北区党委直接领导。鄂西北区党委书记是王瀚同志。那时，当阳、荆门沦

陷，我们打游击。远安没有沦陷，继续地下活动。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一九四七年七月，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战略反攻，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九、十月间，由江汉独立旅张才干等同志成立江汉区党委，主要活动在江汉地区。后江汉区党委决定成立襄西工委，由黄德魁同志任工委书记，並以江汉军区警卫团第三营为骨干，会合坚持襄西游击战争，组成襄西独立支队，黄德魁任支队长兼政委，许猛任付支队长，段玉美任支队政治部主任，开辟襄西游击区，建立襄西革命根据地，活动在南漳、远安边界。一九四八年二、三月间襄西支队向远安、南漳、东巩、巡檢司、马良坪一带挺进，解放了南漳、远安两县的边界地区。一九四八年六月，襄西打开了，江汉区党委决定成立襄西地委和军分区以及襄西专员公署，地委书记彭天琦，我任付书记兼专员，军区司令员黄德魁、付司令员邹必兆、汪昌桂。在此同时成立了荆钟、南远、荆当、江枝等四个县委、县政府和指挥部。南远县委驻东巩，由段玉美、陈伯乾、杨筱震等同志负责。

一九八〇年四月一日

（根据刘真同志讲话整理）

何基沣同志抗战时期 在远安的二三事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五届政协常委、原农业部付部长何基沣同志不幸逝世的消息。噩耗传来，远安人民沉浸在无限悲痛之中。一九三九年四月至一九四五年元月，何基沣担任国民党三十三集团军七十七军一七九师师长职务。该师就驻扎在远安。在这五年中何基沣同志在党的领导下，为国为民立下了丰功伟绩，时间虽隔四十年之久，但迄今还被远安人民所传颂。

何基沣同志是河北大城县人，他早在青年时代就立志救国，投笔从戎，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一九三七年，何基沣同志任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旅长，驻守芦沟桥一带。在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主义，一再命令部队后撤的情况下，七月七日，日本侵略者出兵侵犯芦沟桥，何基沣指挥部队奋起抗敌，打响抗战八年第一枪。一九三七年底，何基沣部驻河北省大名府。因大名府失守，他气愤地朝自己胸部打一枪，经抢救脱险。在养病期间，何基沣同志秘密地前往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受到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接见。后来，他根据我党指示，回到原部队工作。我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友军工作组进驻何基沣部队。在党的教育下，何基沣同志从一个爱国军人变成共产主义战士，于一九

三九年元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何基沣同志于一九三九年四月率领一七九师驻守远安。在该军中我党组织关系，由鄂西北区党委领导。

一九四〇年初，蒋介石下令，凡国民党军每个师都要成立搜索队，既侦察日本人，又侦察新四军。何基沣同志秘密向曾志同志请示，并建议一七九师的搜索队由荆当远中心县委负责组织，必要时交给新四军。中心县委请示边区党委后，立即派去数十名党员和抗日根据地农民积极分子约一百五十人去背枪，並委派周正任队长。这个搜索队是加强连的编制，其军需装备全部由一七九师供给。编成后，开赴江汉以东地区活动。不久，就交给了我军，改编为边区党委警卫连。一九四〇年六月初，由毛凯同志带到襄西，成为襄西独立团的骨干力量。同时，为了装备和充实我军抗日军事力量，以搜索队的合法名义，在远安的漳、沮二河和川民间柏木船只，几次巧运步枪、子弹、棉衣、时币给新四军五师和襄西独立团。在当阳观音寺的徐家港口由我地下党员刘保田同志秘密接交，计枪支五百多条，子弹三百余箱，棉衣六百多套，时币五万多元。这些援助我军的物资，对抗口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一定作用。

一九三九年四月，何基沣一到远安，就立即领导指挥在洋坪夜红山顶上，修建了一座高达十米的“鄂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在碑身的左、右两侧和背后分别镌刻有何基沣、吉星文、张济卿的亲笔题词，写道：“浩然正气”、“抱泽哀思”、“气壮山河”遒劲有力的大字，以此来悼念为国献身的抗日阵亡将士。

抗战期间，远安伪县长更换频繁。当时，伪县长程晓波

别有用心，大摆宴席请何基沚。何基沚身穿粗布军衣，紧扣风领，打着裹腿，骑马赴宴。

盛宴会上，远安名菜名酒，山珍海味挤挤满满地摆了十几大桌，热气腾腾，酒味飘香。程晓波为了卖弄风骚，特地穿上淡青色的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他一见何基沚到来，便脱帽鞠了九十度的躬，低身说道：“钧座，千里迢迢，不辞劳苦到此地进行抗日救国，真是可敬可佩，我代表县府全部官员表示热烈欢迎！对我们为党国工作情况，请多加指训，我们不甚感激！大家欢迎！”

在一阵狂热的掌声中，何基沚紧紧风领，用严厉的眼光向全体官员扫视一遍，提高声调说：“诸位，现在国难当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大好河山，人民惨遭杀戮。我前方军民死的死，伤的伤。死的没人埋，伤的没人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日每时我们前方都有勇士流血牺牲；我们后方呢！却在这里大摆宴席！狂欢作乐。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我们良心何在？兵法云：‘将不知兵，以其卒予敌也，卒不服习，以其器予敌也，故知与习为治兵之先务，必简练而素习之。’我们在座官兵应该到外面苦练杀敌本领，怎能在宴会中等闲视之？！束手待毙，忍心做亡国奴！？宋代爱国主义者文天祥临死前留下两句名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们一切有志救国的民众都要投身于抗日救国大业之中，我们官兵更是责无旁贷。程县长你说对吗？”程晓波头冒冷汗，尴尬地直点脑袋说：“钧座言之有理，言之有理，抗战是头等大事，头等呀……”

这次宴会，程晓波没有得到半点油水，花钱买了个“教训”。

为民除害，打击地方反动势力，扫除阻碍积极抗日的绊脚石。

一九四二年二月，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党政工作总队》第四队队长、特务分子余涛亲自逮捕了望家冲小学教师、积极宣传抗战的爱国青年贺锡龙，当即转一七九师关押。国民党特务机关对贺锡龙多次刑讯逼供，要贺承认是共产党员和交待出地下党组织。贺锡龙表现英勇、无所畏惧，摆出个“鱼死网破”之势。战斗在伪一七九师的党小组，急中生智，与何基沣同志商量，设计编造了一个所谓“南远边区特区”的组织机关和党员名单，黑夜丢在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党政工作总队》第四队特务分子住处。国民党特务机关拾到这个名单，如获至宝，对贺锡龙进行逼供，核对名单。国民党特务机关完全按照这份名单，逮捕了伪县长肖掖核、建设科长刘直伐、粮食科长杨希振、涂盈枚、县党部常委陈家锦、中学校长汪维轩、县参议员付蕩亭以及伪乡长、联保主任等六十多人。这就是震动湖北全省所谓《远安奸党案》奇闻。这一行动，沉重地打击了远安县的伪政权机关和反动势力。

覃新山是远安上半县有名的恶霸地主、汉流大哥。他欺压群众，强占民妻、拦路抢劫，杀害我革命战士和无辜群众，无恶不作。何基沣同志了解此事后，把覃新山以及陈保九、陈斗山、刘贵三等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坏蛋关押起来。将覃新山在芦溪寺伪监狱中整死，为民除了一害。

何基沣同志爱人民，时刻关心群众的疾苦，把民众利益放在心上。

远安县地处鄂西山区，当年这里的农业生产落后，百业

凋零，人民生活十分贫苦。何基沣同志驻远安五年间，领导部队和当地人民修建两条渠道。一条从三板到杨家店，一条从芦溪湾到徐家棚。两条渠道全长二十余华里，基本上可供洋坪、杨家店、徐家棚等地两千多亩水田的灌溉。郭家堤这地方面对沮河、背靠大山，常常受到洪水的威胁，人们生命财产没有保障。何基沣同志命令部队在河边修了一条长达百余米的拦水坝，确保水田三十多亩，民房三十余间。还在程家榜的李家溶修了一口水井，解决了附近群众的吃水问题。

一九四二年春，一七九师下属一个工兵营驻在胡家冲郭家堤。一天，一位老太婆提着一篮子鸡蛋到该营驻地去卖，被一个工兵抢走了。此事被何基沣察觉后，就地召集全工兵营开会，查出了那个抢鸡蛋的兵，罚了三十扁担，当场付了那个老太婆的鸡蛋钱。老太婆感激得热泪盈眶，捧着钱磕着头说：“何师长真是个大青天啊！……”

一七九师师部所属的辎重营、工兵营、警卫营共一千多人，磨面要当地群众供给，每天要交面粉二千余斤，占川劳力三十多个，对农业生产有影响。何基沣同志得知此事后，下令通知各营食用磨面全部自给。群众再也不为磨面担忧了，大大减轻了群众的负担。许多群众说：“何师长的心同种田人的心连在一起啊！”

“远安奸党案”始末

贺 锡 龙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我在远安西北山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教育活动的时候，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发生不久，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武汉公开创刊，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群众》周刊在武汉公开出售。在这两种报刊上，我开始阅读到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党公开发表的一些文件，如《论新阶段》、《论持久战》等。读这些著作，开阔了我的政治眼界，对党有了了解，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的危亡。

一九三八年，日本侵略者继攻占当时我国首都南京之后，又进逼武汉。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以郭沫若同志为首的政治部第三所，团结和组织了大批党员与非党的进步文化人，运用戏剧、歌咏等文艺形式，开展了轰轰烈烈、影响全国的“保卫大武汉”的宣传活动。在这抗日救亡宣传高潮的推动下，我和叔伯弟弟贺锡麟在武汉乡下汉阳蒲潭小学（我父亲任教于该校）发动群众，组织学生排出了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话剧《最末一计》等抗战剧目。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沦陷前夕，我们全家九人，不愿作亡国奴、不愿当顺民，辞别了家乡黄陂白云的地方，途径沙市、宜昌、流亡到原南漳县店子垭（店子垭现属保康县）我姨父的故乡。

一九三九年初到一九四一年底，我先后任教于远安大郝家坪、苟家坪、望家冲小学。在教学中，通过语文、历史、音乐等课程，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如自编历史教材，着重编选现代史，其中有些章节，以斯诺《西行漫记》为蓝本，介绍了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革命事迹，还讲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中若干传奇性的故事，深受学生欢迎。教唱的歌曲，大多是抗日救亡歌曲，如《流亡三部曲》、《新编九·一八小调》、《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募寒衣》、《延水谣》、《长城谣》等。语文课通过作文，办了多期墙报《文艺阵线》，吸引了不少读者，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为了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我组织学生成立了“荆山孩子剧队”。我全家人都参加了剧队工作。一九三九年七·七抗战两周年的时候，在望家冲搭台演出。这次演出规模甚大，观看演出的群众有好几百人。演出的节目，大多是我们自编的。如我编的话剧《新打城隍》、《张家店》，我三妹贺云霓编的儿童歌舞《狼外婆》、《娃娃兵》，我和三妹共同设计的《打铁舞》、《镰刀舞》。

在这次演出后，我写了一篇题为《七·七抗战两周年在远安望家冲》的通讯，发表在《武汉日报》上。不料这篇通讯触怒了望家冲的大恶霸地主刘贵三。他多次派人把我弄到他的碉堡里，进行恫吓，要我写一篇通讯，为他歌功颂德，如不同意，将派人在打湿旗（地名）一个峡谷地带，等我路过时挖掉我的眼睛。我未理睬。这是我在远安与当地反动势力发生矛盾，开展斗争的第一个回合。

《荆山孩子剧》演出宣传活动，开始在望家地区，后来

扩大到苟家堰、荷花店、洋坪、徐家棚一带。一九四一年冬天，剧团在伪县政府所在地芦溪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演出，有四个乡的人民群众冒着风雪观看。《荆山孩子剧团》的演出活动，揭露了日寇的侵略暴行，宣传了抗日救亡的道理，大大激发了远安山区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同时，我们的宣传活动也引起了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反动势力的注视。

我与“汉流”接触，也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怀疑。我企图通过“汉流”帮会关系，搞到枪支，打算在日寇进犯远安时，拉队伍打游击。我有意的同刘贵三的儿子，宁远乡自卫队队长刘于青和望家冲小学校长李天成接近。在他们的“引导”下，我参加了“汉流”，并被举为“柜候三哥”。

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反共高潮，政治形势日益险恶。这年秋天，望家冲突然出现一个“张专员”，据说来自重庆。他以养病为名，在刘贵三家住了几个月。他经常到望家冲小学听课，抽阅学生作文，看墙报。他找我谈过几次话，问我为什么不加入国民党、三青团，还问对抗战前途与国共两党有什么看法。我当时已觉察到这个“张专员”是特字号人物，对于他这种“忠诚测验”，除了作一番政治表白，说明不是共产党员之外，还有什么好说的。我感到处境危险，于一九四二年初离开远安望家冲小学，迁居南漳店子堰。但是，国民党特务仍然跟踪不放。二月间，远安县伪县长肖液核突然来函，要我即日去远安芦溪寺伪县政府一谈。我当时想，逃避是不行的，不如冒险前往当面要求肖液核澄清事实真相，可能要好些。我这种天真想法，使我陷进了国民党反动派早就布置好了的网罗。我到达远安芦溪寺的当天下午，去徐家棚街上买东西，被伪

第六战区“党政工作总队”第四队队长，特务分子余涛亲手逮捕。当晚，转到国民党驻军一七九师师部关押。

关押期间，对我多次刑讯逼供，迫我承认是共产党员，要我交待出远安党组织成员名单。我在武汉时曾耳闻目睹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反动政府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知识分子的血腥罪行，深知他们“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放走一人”的罪恶行径。自念既已被捕，迟早不免一死，不如干脆与国民党反动派拼个“鱼死网破”。于是，我就顺着国民党特务的主观想象，编造了一个所谓“南远边区特委的假组织，把远安县伪官吏以及上溪劣绅肖液垓等五六十人牵扯进去了。国民党特务愚蠢得很，竟完全按照我的假供，逮捕了肖液垓等五六十人。国民党政府宜昌专员兼保安司令员吴良琛亲领一团军队到远安解除了刘贵三、李吉庭自卫队全部武装。我这一行动，沉重地打击了远安县的伪政权机关，使敌人演出了一场狗咬狗的闹剧，这就是所谓“远安奸党案”。

一九四二年秋，伪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党政工作总队对他们一手制造的所谓“远安奸党案”进行最后会审，他们才搞清了假供。“党政工作总队”还举行了一个“结案会”，宣布我所假供出来的人无罪释放，要我在这个会上讲清楚为什么要假供。我在讲话中痛骂了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在远安的走狗们。“结案会”后不久，我被伪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以所谓“蓄意破坏地方党政机构、危害中华民国的罪名，判处死刑。经我叔父贺有年（当时任伪省参议会秘书长，是一个爱国人士，解放后任省政协常委、付秘书长。）会同舅李四光（大科学家）、石瑛、严立三（叔父的友好）、施方白（陈诚的顾问，爱国人士，我叔父的友好）等人出面大力营

救，才由死刑改为无期徒刑，送集中营“受训”。一九四四年底，被保释放出狱。

武汉解放后，我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偿了我多年宿愿。

最后，对生活战斗在远安的父老兄弟姐妹以及我旧日的学生们，致以亲切的问候，并对他们给予我和我全家的关心，谨表诚挚的谢意。

一九八〇年十月于武汉市

《宜昌抗战剧团移动演剧第一队》

在 远 安

汪 玉 宸

一

在武汉沦陷前后，宜昌市成了重要的战略后方。大批逃难的、流亡的人们聚集到这里，使入川咽喉的宜昌变得热闹起来。就在这时，一支在地下党委领导下的文艺尖兵——《宜昌抗战剧团》先后公演了《救亡图存》、《古城的怒吼》、《中华民族的子孙》、《凤凰城》等话剧，起到了鼓舞人民抗日斗志的巨大作用。抗战剧团团长冷善远接受上级指示，决定挑选一部分男女青年，组成《宜昌移动演剧第一队》，配合荆当远中心县委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这支队伍共二十九人（男二十人，女九人），陈穆、陈沫潮为队长，我为交际。这批同志中年龄最大的二十七岁，最小的十三岁，有六个大学生，二十二个高、初中生，就是我一个半文盲，大部分是宜昌市和宜都人。这支文艺队伍的特点是：年青、纯洁、爱国热情高、爱憎分明。当时，被党内外人士誉为